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大学梦：大学发展之道

齐鲁高教论坛2013年会论文集

蔡先金 宋尚桂 王希普 ◎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大学梦：大学发展之道

齐鲁高教论坛 2013 年会论文集

蔡先金 宋尚桂 王希普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本书得到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梦:大学发展之道 / 蔡先金等主编.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70-0699-7

I. ①大… II. ①蔡…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改革—
研究—中国 IV. ①G64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87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youyuanchun67@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由元春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23.25

字 数 430 千

定 价 46.00 元

大学沉浮：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梦”

(代序)

蔡先金

要想懂得现在，我们就得了解过去；要想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我们就得借助过往的坐标；要想准确预测未来，我们就得利用历史这面镜子，因为“未来是由历史条件预先注定的”^①，倘若按照孔子的话说，那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也”^②。中国大学渊源有自，中国大学梦也不是凭空而生的。现在倘若想真正地理解中国大学发展的现状以及设计中国大学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回首中国大学那曲曲折折的来时路，可谓诞生于忧患，成长于战争与动乱，起起落落，历经沉浮；倘若我们要透彻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么就应该回望一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梦。

一、近代中国“大学梦”的铺垫

泱泱中华，几度威仪万邦；巍巍华夏，唯独文明赓续。华夏民族为何能如此？这与其自古有之的发达教育体系不无关系，《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辟雍”、“泮宫”还是书院，皆非世界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因为现代大学制度无论如何都是“舶来品”，即使与本土固有的教育制度相融合与嫁接。自从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往的“天朝梦”惨遭破碎；“西学东渐”之潮取代了“东学西渐”之浪，于是国人产生了接受与举办新式大学教育的梦想。此时有一明一暗的两股力量助推近代“大学梦”的萌生。从明的力量来说，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洋务派为梦想成真身体力行，兴办新式学堂。从暗的力量来说，西方列强庇护下传教士传播了新式教育的思想，并亦不遗余力地创办教会大学，推行西方教会教育，结果导致中国近现代“大学梦”的追逐与铺开，演绎出数度梦逐与梦碎的风云画卷。

① [美]埃德蒙·菲尔普斯. 大繁荣[M]. 余江译. 中信出版社, 2013: 扉页, 卡尔·波普语.

② 《论语·学而》.

（一）传教士做起了教会大学的“鸠居梦”

《诗经·召南·鹊巢》载：“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说的是鸠强占鹊的巢用来居住，并在他者的巢里生养休息。近代夷者来华，西洋人就犹如那鸠，在中国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时任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的英国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的日记可说明这帮人的野心，他在1865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①作为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搬运工的传教士就做起了“鸠居”般的大学梦，试图直接在中国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构建属于自己的教会大学。西学东渐虽说滥觞于明代，其实西学真正对于中国教育产生直接影响应该从19世纪的教会学校开始。教会学校是在中国传统教育陷入危机的时候乘虚而起的，1839年(道光十九年)，伦敦传道会创办的“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成立，由英国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出资办学，马礼逊协会管理。这是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教会学校，成为了基督教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开端。在大陆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应是山东的登州文会馆。1863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来到中国，于次年(1864年)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1876年该学堂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具备了中学水平。1882年，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文会馆为大学。到1889年，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在华举办的学校总数约2000所，学生数约4万。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为当时各教会学校统一编纂教科书。^②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大地上的教会大学已蔚为大观，并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允许其自由开设，“亦毋庸立案”，更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制约。教会学校在输出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与启迪”^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看来，西方教会学校在华“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华为建立近代意义的大学提供了示范性的借鉴。^④张百熙在《拟进学堂章程折》中坦言，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⑤

① [美]布鲁纳，费正清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1863—1866)，陈绎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341-342。

② 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9-30。

③ 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2。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70。

⑤ 谭伯牛，假维新中的真改革，新京报编《科举百年》，同心出版社，2006：73。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教会大学的宗教性质与文化殖民的目的。而今评价教会大学应该功是功,过是过,真正做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无论如何,教会大学的梦主要是传教士以及西洋人的“鸠居”梦。

(二)洋务派铺起了新式学堂的“新学梦”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端。洋务派举办“新政”,标榜“求强”、“求富”,企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某些制度办法,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此,洋务派遵循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在传播西学和提倡新教育的活动中创办了洋务学堂,这些新学堂“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对清末的学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有所促进”^①。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最早采用班级授课制,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历25年之久,由此可知同文馆与西学之关系。据统计,从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到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洋务派共创办近代学堂22所。其间东西学之间虽然有论争,但“更多的人认识到学术本为一体,不分中西”^②,如王国维在1911年所云:“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③

由此看来,中国新式教育机构主要渊源于两种方式:一是本土人士借鉴与引进西方办学理念与制度来举办本土的教育;二是西方人士直接在中国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举办的教会大学。无论是新式学堂,还是教会学校,甚至是出洋留学,不但铺垫了国人的“大学梦”,而且铺开了大学梦追逐的历程。

二、“大学梦”的第一次梦逐与梦碎

19世纪末期,大清帝国垂垂老矣,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然而,华夏子孙浩气弥漫,有志之士欲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发起维新变法,力图国富民强,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兴办教育,建立大学,就成了维新派选择的变法之一。维新派的逐梦过程从此展开。但结果只能以梦碎结束。这就造就了中国有志之士第一次悲壮而酸楚的大学梦的破碎。

(一)“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1894年,中日之间发生了海战,史称甲午海战。海战结果,清廷无能,惨败

① 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55.

②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50.

③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50.

而终。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大国输给了区区小倭，国人当然不甘，反思输在何处？从政治体制角度看，可能是输在没有“维新”上；从教育角度来看，那就可能是输在“课桌”上了。

日本近代转型得益于明治维新。明治天皇自 1868 年建立新政府始推行全面西化与近代化改革运动，努力做到“文明开化”，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倡导“置产兴业”，科技上效法欧美，教育上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由此看来，国家富强是与建立新式高等教育相关联的。放眼近代世界，大学立则民族立，大学强则国家强。

1895 年，举国处于战败氛围之中，京城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①，标志着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②

（二）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1898 年，以光绪帝为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而成立大学成为唯一写进这一维新纲领性文献“天字第一号”的改革项目，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学习”。这一诏书的颁布以及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国人，尤其是维新派，第一次圆了建立大学的梦，从此华夏大地上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预示着中国教育告别太学、书院和私塾时代，与世界近代教育正式接轨。毫无疑问，京师大学堂是维新派仿效“泰西”之结果。但是，也毋庸置疑，是建立在中国这块具有五千年教育传统的黄土地之上，黄色显然是其背景或基调。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陈言：“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③可惜这次政治改革运动最终演变成为了政变，结果保守势力大占上风，诛杀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命丧黄泉。维新人士第一次遭遇“大学梦”破碎之痛。

维新派人士大学梦兴也勃焉，碎也忽焉。戊戌维新失败后，风雨飘摇之中的京师大学堂岌岌可危，但这次“大学梦”却碎而不灭。天不负人，这所大学堂成为维新变法中唯一得以存活的重大改良成果。国人“大学梦”既已铺开，就努力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结果。从官方来说，清政府 1901 年 8 月颁布“兴学诏

① 无论后来史学家如何考证该事件的真伪，无论康有为在其中充当何种角色，但是“上书”之事还是存在的。

②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 中华书局, 1964: 1.

③ 曲士培.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 338.

书”，昭告“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加拿大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曾做如此评价：“当时诸公既没有真正懂得欧洲大学的精神，也没有认真仿效它的办学模式。”“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与其说是一所具有自治权的高校，不如说是一个同以前翰林院和国子监类似的教育行政机构……但是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问题则直到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受到重视……”^①

清末国人顽强地追逐“大学梦”，努力让梦想成真。然而，国人却遭遇了第一次梦碎与心碎的历程。新生事物的发展莫不如此，在曲折中前进与成长。

三、“大学梦”的第二次梦逐与梦碎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成为了“亡朝廷”的催命符，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1912年1月1日，承载着国人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民国”时期，国人再次追逐大学梦，在梦逐与梦碎中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美丽的传说。

（一）悲苦的“大学梦”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大学梦呈现出悲苦的基调。有识之士马相伯怀揣“教育救国梦”，毁家兴学，决心兴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自任校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马相伯具有自己的治校理念，特别强调：“学术之根，自由为本”，他认为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主张办学“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但是，马相伯的大学梦同样遭遇了从“震旦”到“复旦”的破碎与追逐历程。

民国大学管理体制变革出现“无厘头”现象。1927年6月，张作霖进驻北平，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指令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②，并宣布了一系列的条令：禁止使用白话文、禁止学生集会请愿、教员缺课要扣发薪金、处罚学生可用戒尺打手心等等。这是一个地地道道“无厘头”式的大学变革，结果大学事业可谓奄奄一息。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南京派阎锡山军队

^① [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4。

^② 那时的所谓“国立九校”，就是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政法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这九所学校的经费都由教育部拨款，因而谓之“国立”。当时尚有以“庚款”为经费的“清华”、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交通部办的交通大学、财政部办的税务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各有专款，只叫“公立”或“部办”，而不叫“国立”。“清华”直到后来，才加“国立”二字。

接管京、津，宣布全国统一。国民党为了取得教育大权，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便设想效仿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1927年6月间，南京政府先设立了“大学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请了一些只发干薪，不必上课、上班的教授。^① 该年6月，李石曾与易培基提出建议，改北京大学为“中华大学”。后因北京大学师生坚决反对，通电抗争，该提议落空。李石曾又建议因北京已改称北平，便应改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亦未得逞。后又确定全国划四个大学区，即北平、江苏、浙江、广州四区。1928年起，国民党政府在各地强制推行“大学区制”和“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即鼓吹对“党国”、“领袖”尽忠，用篡改了的“三民主义”去感化倾向革命的青年。所谓大学区制，即以国立大学校长管辖全省教育行政及一切学术事宜；便于国民党控制各种学校。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滥”，停办和封闭了部分进步学校。在保留下的学校里，国民党建立“党务指导委员会”，监督党化教育和“大学区制”。这些政策实行后，引起全国强烈不满。北平、上海等地学生奋起反对“大学区制”，反对合并或关闭学校，开展了英勇的护校运动。1929年6月，在各地学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得宣布取消“大学区制”。

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势虽然给大学人带来了有限的苦涩的浪漫，但是动乱与战争造成的大都是大学的苦难。1948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分崩离析，“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潮迭起。如该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前挂起了“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大字招牌，情景十分凄凉，时人评之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② 至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可想而知。

（二）大撤退与“西南联合大学”神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紧接着北平沦陷，天津失守。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保护 and 抢救平津地区教育，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平津高校迁往内地。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就这样，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学大撤退开始了。北大、清华和私立南开大

^① 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鲁迅日记》1928年1月31日记云：“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份薪水。”

^② 陆建东，陈寅恪，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3。

学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校舍为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11月1日正式开学。随着日寇步步入侵，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被迫撤销，三校迁往云南，5月4日在昆明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946年秋，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平津复校。

那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在日军空袭中检验着师生的灵魂，在食不果腹中锻炼着师生的意志，在民族危险关头锤炼着师生的精神。他们不乏浪漫，不缺理想，不少意志，有的是不倒的精神，坚持民族大节，造就了一幕幕大学神话。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绝非偶然。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群，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西南联大把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倡导和树立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从而创下了中国高教史上的奇迹。一大批中华儿女在这里演绎着伟大的民族故事，一大批民族精英在这里书写着知识分子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他们犹如不朽的群雕矗立在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

（三）借镜西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因为政府外交失败，抗议游行，展开日后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6个月内，共有过400多种新刊物，全用白话文出现于报摊上。这个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尽力向学校拨款作为教育经费但不干预学校事务，实行“放任态度”，要求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在学术界产生了各种新思潮、新主义，并在知识界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宽松的时期，从而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回顾1910~1920年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启蒙，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教育运动，同时也折射出对于西方大学理念与制度的借镜，后来的许多大学校长皆有留洋背景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留学德国、法国）、蒋梦麟（曾任北京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留学美国）、胡适（曾任中国公学、北京大学校长，留学美国）、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留学美国）、竺可桢（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留学美国）、罗家伦（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任鸿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留学美国）、胡先骕（曾任中正大学校长，留学美国）。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1917~1923）可谓直接取法西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乃至学术和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中国人单方面对德国大学

观进行移植的尝试，是一个自觉选择吸收的过程”。^① 蒋梦麟则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他们对于西方大学的态度，无论是“拿来主义”，还是“扬弃主义”，结果都是将西方的蓝色海洋教育文化渗透在本土的黄色教育土壤之中，影响至今。

（四）大师远去

清末民国时期，精英卓越，蜂拥而起，可谓是新的“诸子时代”。这些大师级人物历经风云际会，远离而去，现只可成追忆。鲁迅发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呐喊，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梅贻琦给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口号，胡适发明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之法，陈寅恪称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们还会记起许多大师以及著名学者，林语堂、钱穆、刘文典、傅斯年、闻一多……他们人格独立，著作等身，名闻天下。后人诉说着他们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塑造着那时知识分子的群雕，面对大师的背影，人们呼唤“归去来兮”。

民国时期，国人“大学梦”遭遇了第二次逐梦与梦碎的历程。人们将其梦逐的过程视为大学人的精神乌托邦，而将那时美好的大学设想留在记忆的深处，不免还会产生一些对大学黄金期的幻想。

四、“大学梦”的第三次梦逐与梦碎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国人在热情高涨中誓言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西方的大学思想与办学模式在1949年之后，在中国走向终结。随着当时的中国外交向前苏联“一边倒”，教育模式也必然呈现“一边倒”现象。在“以苏联为师”政策的影响下，高校教育体制向前苏联靠拢，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前苏联模式。在国家的强制力量下，在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管理下，大学纳入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带来的结果也必然是政治性改造与行政性干预。美国教育学家卡扎米亚斯说过，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

（一）1952年：“梦到苏联”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6月至9月，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

^①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7-108.

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把民国时代的所谓欧美高等院校体系改造成“苏联模式”。调整工作于1953年结束。经过调整后，不仅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全国高校数量也由227所减少至181所，原来著名的高等院校几乎经历了面目全非的结构改造，工科院校与综合性大学比例严重失衡，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这次“院系调整”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各大高校相继开展了“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前苏联的教育理论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逐章逐节地进行学习。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教体制影响巨大，结果是高校人才流动面大，社会学科遭裁撤，高校失掉办学自主权。教会大学与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

（二）1958年：大学“大跃进”

1958年至1960年间整个国家进入“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高校的数量及其大学人数的急剧增长是十分惊人的。1957年高校数量为229所，1958年为791所，1960年达到1289所。学生数由1957年的441,000名增加到1960年的961,000名。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

（三）1962年：“小黄金期”

为了纠正“大跃进”的严重后果，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等教育领域同样进入了一个反思阶段，出炉了“高校六十条”^①，带来的结果就是1962年至1965年所谓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小黄金期”。

^① “高校六十条”或称“高教六十条”，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讨论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1961年3月起，由邓小平领导，教育部起草初稿，经过调研和数易其稿，7月29日至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修改，邓小平、陆定一等联名致信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报告起草和修改情况，并决定由陆定一组织继续修改，教育部组织到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征求意见。9月，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其进行了讨论、批准。一些高校的教授还提出，希望把条例刻在石碑上，反映了人们渴望政策不变的殷切心情。

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得到了压缩。学校数由1960年的1289所调整合并为1963年407所,在校生由96万人减少为75万人,到1965年,在校生数字下降到67.4万人,专业设置得到了调整和规范。修订高等学校专业目录,1958年初全国219所高校共有专业363种,其后两年间新增上千种,种类多、专业窄、不规范的现象严重,1963年调整为510种(其中绝密、机密专业78种)。《高校六十条》纠正了1958年至1960年“教育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教学的偏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的经验教训,是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及特点的努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准高等教育法”的作用。

限于历史原因,“高校六十条”始终是个暂行草案,规定只在高校党员中讨论,全体师生中宣读,不在校外公布、报刊发表,虽声称拟经讨论、试验、修改后再正式公布。“文革”后,为了规范高校管理,1978年10月教育部又修订试行,基本沿用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印发之前。

(四)1966年:大学不再是“大学”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爆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工农兵大学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创举。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招收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文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以北大为例,当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训班)2392人,其入学文化程度分别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的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资料显示,1970至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人。

这里引用一下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纪念350周年校庆时的讲话作为一种比较性的反思:“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①

五、新时期“大学梦”的共筑与梦圆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局面。“文革”结束,百废待兴。1978年3月18日至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大会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郭沫若作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闭幕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国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再次起锚了国家建设的航船。教育改革以及大学建设又一次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一)1977年:恢复高考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8月13日到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作出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季,而是在冬季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七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七八级学生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其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以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1998年:中国要有世界一流大学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为了

^① [美]德里克·博克. 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讲话. 王虹译. <http://hi.baidu.com/huancool102/item/727c2f0c22a0e479bfe97ef7>, 2014-3-14.

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此,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1999年我国正式启动了以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标志的“985”工程。2002年4月29日,江泽民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大会上,再次提出:“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并要求“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做到四个“必须”: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至此,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的四大功能,首次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高校的功能之一,这是高校功能的最新发展。“没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支撑,遑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①在我国政府的文件资料中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即“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继续实施‘985工程’,要坚持走‘有特色、高水平’发展之路,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既要体现国情,又要坚持国际公认的标准;既要在可比办学指标上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当,更要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既要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更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先进文化。”近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已经在国内多所大学提出来,建设一批能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国人的奋斗目标之一。

(三)1999年:进军高等教育大众化

按照马丁·特罗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扩招以来,于2003年大学入学率达到15%,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98年高校招生数仅108.4万人,1999年猛增到159.7万人,增长率为47.3%,以后几年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招生数仍不断增长,直到2006年增长率为11.5%,招生数为530万人,高校扩招告一段落。2007年、2008年高校招生增长率分别为6.9%和5.6%。1999年国家实施扩招政策,经过10年的发展,2008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达599万人,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12月发布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的教育卷

^① 李军,许美德. 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 3.0. 社会科学报,2013-04-18(5).

中指出,大规模扩招十年来,全国毛入学率已由 1999 年的 10.5%,提高到 2008 年的 23%,完全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一巨大成绩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值得令人瞩目的,亦可谓是世界之奇迹。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大,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崛起的主要标志,亦显现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除此之外,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还表现在不甘落后,在打造“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的口号下奋力前行的态势。

(四)迎接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

从全球视野看,“东学西渐”或“西学东渐”皆为学术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与接受。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世界高等教育重心会转移到不同的国家,从而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迄今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转移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第二次是从英国转移到德国;第三次是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而且每次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都与世界科技中心与经济中心转移产生同步共生现象,既反映了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的密切关系,又反映出高等教育确实是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的过往历程蕴含着规律与启示,从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条件与趋向看来,中国在下次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机遇,因为中国目前发展的各种迹象与世界高等教育重心转移条件与趋向具有契合之处。中国倘若在未来能够抓住转移机遇的话,那就应该未雨绸缪,重在考虑社会发展转型中高等教育实践重构的问题,以便重建高等教育新秩序,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华丽转身。

中国梦现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走中国道路的感召与呼唤。倘若说梦是愿望达成的话,那么中国大学梦理所当然地就是“中国梦”的重要元素,因为大学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实状况,大学的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高度的一个标尺。中国大学梦应该契合于中国梦,既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中国大学梦就应该是超越自己、包容他者、推动世界高等教育重心东移。我们现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奉行“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那么,中国大学的崛起必将是中国崛起的显著标志。相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①,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勇于迎接前进征途上的各种挑战,那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国人的大学梦也一定能够实现。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7.

目 录

- 1 大学沉浮：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梦”

理论篇



- 2 教育家型大学校长的内涵与特质探议
- 11 掀探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发展及其现实启迪
- 32 关于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些认识
- 37 新形势下我国普通高校法学本科人才培养困境与应对
- 45 信仰之光将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
- 49 探索创业型大学之路，引领高职发展新突破
- 54 加强校外基地建设，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 58 欧美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综述
- 64 大学章程的内涵、本质及其功能基础
- 71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 78 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 84 高校发展之梦与“六劳”意识教育
- 89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认知心理学的启示